

中国
谚语
集成



577
17

中国谚语集成

西 藏 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西藏卷编辑委员会

中 国 I S B N 中 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
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周扬

副总主编：(按姓氏笔画顺序)

马学良 任英 林默涵 周巍峙(常务)
钟敬文(常务) 高占祥 贾芝

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

大丹增	马振	马学良	马春阳	王士媛	王世兴
毛星	乌丙安	龙海清	田兵	刘琦	刘守华
刘清惠	刘魁立	刘辉豪	刘锡诚	许钰	李克
李耀宗	吕骥	曲子贞	任英	牟耕	宋孟寅
宋彦明	杨亮才	吴景春	季仲	季沉	张文
张涛	张紫晨	官却杰	林默涵	周扬	周骥良
周巍峙	姜彬	胡尔查	钟敬文	贺嘉	高少峰
高占祥	贾芝	徐守正	徐洗尘	殷海山	陶阳
陶立璠	陶建基	常泊	董均伦	蓝鸿恩	廖东凡
黎本初	魏心一				

总编辑部主任：贺嘉

《中国谚语集成》主编及编审人员

主编：马学良

副主编：廖东凡(特邀) 陶阳 陶立璠 李耀宗

特约审读：吉星

责任编辑：刘晓路 朱芹勤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西藏卷编委会名单

主 编:丹 增

副主编:强巴平措 塔热·次仁玉珍 才旦多吉

编 委:(按藏文字根排列为序)

贡桑坚赞 吉普·平措次登 丹增 大丹增 登巴雅杰 土 呷
德吉措姆 塔热·次仁玉珍 德门·德庆卓嘎 班 觉 白玛朗杰
普布多吉 陈来塔青 措 姆 才旦多吉 王希华 达瓦次仁
李 彬 何宗英 吴 坚 乌坚多吉

《中国谚语集成·西藏卷》编委会名单

主 编:才旦多吉

副主编:德庆多吉

编 委:(按藏文字根排列为序)

张 鹰 扎西次登 吉普·平措次登 克 珠 嘉措顿珠 丹 增
大丹增 塔热·次仁玉珍 土 呷 德吉措姆 德门·德庆卓嘎
德庆多吉 巴桑罗布 白玛朗杰 普布多吉 赤列曲扎 陈来塔青
强巴平措 强巴班宗 央 金 才旦多吉 才 加 次 多
措 姆 达瓦次仁 达瓦扎西 李 彬 桑 珠 何宗英
拉巴次仁 吴 坚

特邀编审:廖东凡 李 彬

美 编:扎西次登 张 鹰

总 序

遵照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1984年联合签发的《关于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省、地（市）、县各级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组织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及基层文化单位进行全面普查与采录，又经层层汇总选编，而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的《中国谚语集成》，终于陆续编定出版问世了。这套集成的编纂出版，是为了辑录、保存我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宝贵的谚语文化遗产，并使其在新时代起到实际应用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作用。《中国谚语集成》和另外两套大型系列化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的联袂问世，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学史上一项旷古未有的荟萃之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一项意义深远的建设工程。

一

中国谚语宝藏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然而，它究竟“源”于何时，如何“流”长，却因鲜见确凿之依据而一语难详。先秦典籍援引谚语时，或称“古者有谚”，或曰“先人有言”，或索性指明所引乃“周谚”、“夏谚”。清人杜文澜的《古谣谚·凡例》说：“谣谚之兴，其始止发乎语言，未著于文字。”明确指出谚语源于文字之先。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从我们五十年代所掌握的尚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采风资料中，也可看到谚语同歌谣、神话、传说一样，在原始公社的人群中就已起根萌芽。可惜的是，我国文字产生前的谚语多已流失，无典籍可考。但从谚语历久不泯的这一基本规律却不难推论：现存于可考古籍中的古谚，当有不少是文字产生前的先民遗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源于劳动。作为直接反映人类劳动、生活和斗争经验总

结的文艺形式之一，谚语自然更不例外。当然，在人类的劳动能力和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水平都还十分幼稚的原始社会中，谚语是难以成形的。谚语的成形有赖于人类的劳动生产、生活经验积累到一定的高度，同时也有赖于抽象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发展成熟到一定的高度。当先民具备了这些方面的条件，为了相依为命，交流、传授各自的点滴生产、生活心得，他们便开始逐步将那些行之有效且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一次再次地概括提炼为易讲、易传的短言句式。你讲我讲，久而久之，这种短言句式便渐趋定型，成了所谓“谚语”。在我国先秦古籍中，生产谚就位居古谚之首。诸如《易经》的“士刲羊无血，女承筐无实”、《诗经》的“朝济于西，崇朝其雨”等，出自商周奴隶农牧劳动和天气占验的生产谚，几乎俯拾即是。

谚语发端于劳动，但也并不止于反映劳动生产。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谚语逐步由认识自然，总结劳动经验，而广泛涉足社会生活，涉足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这些后起于生产谚的其它谚语，来源更庞杂，内容更丰富。为了便于表述，我们权且统称之为“社会谚”。社会谚同生产谚一样，依然是人民群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衣食住行之事，统统倾注于谚海，举凡事理德行、时政社交、日常生活，以至风土人情，都不乏精妙之作。这些谚语的总和，反映了劳动人民全部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历史经验，成为世代代人民群众认识生活的教材、陶冶性情的艺珍、斗争自强的武器，以至改造社会的指南。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阶级社会中，当谚海向广袤的社会生活不断扩展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文化”现象。由于剥削阶级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无不与劳动人民形成截然的对立，为了维护并散布其自身的思想，势必也极力设法利用谚语这一具有奇妙交际效应的艺术语言。他们或是扭曲谚语的本旨，随心所欲地“采以为谈”；或是偷梁换柱地对谚语进行篡改和伪作，把剥削阶级的种种思想观念和处世哲学深深地渗透于谚海之中。鲁迅曾指出：“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他同时剖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一谚说，“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寥寥数语，便十分明白地揭示了谚语的阶级性。

我们探讨谚语源流，既要剖析谚海的“两种文化”现象，还需研究谚海海域的消长变迁。谚语既是一种口头传承，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必然会不断出现变异、增长和消亡现象。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谚语也不例外。从谚海整体看，总的趋势是与日俱“长”的；而从各个局部“海域”看，却是从不间断地在时长时消。所谓“时长”，主要是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视野的日趋开阔和经验、认识的日益更新，不断有大量新的谚语涌现出来，致使辽阔的谚海日渐加深加宽。所谓“时消”，主要是指出现在

某一历史时代的一些谚语，或因其所反映的事态已时过境迁，或因其所使用的语言已发生变异，不再为人们所口传、引用，因而又总会随之在谚海中悄然消逝。不难看出，正是这种时长时消的规律，在影响和制约着谚海这一“海域”，使之始终处于永不干涸而又充满生机的流动状态之中。

二

本《集成》编纂方案指出：“编谚语集成，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谚语。”关于谚语的界说，乃是一个自古而今众说纷纭的问题。我国古代见诸书面的谚语界说不胜枚举。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尚书》的“俚语曰谚”；《礼记》释文“谚，俗语也”；《国语》韦注“谚，俗之善谣也”；《汉书》颜注“谚，俗所传言也”；《文心雕龙》的“谚者，直言也”，《说文解字注》的“凡经传所称之谚，无非前代故训”；及《古谣谚·凡例》的“谣训徒歌”、“谚训传言”，二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等等。另有一些典籍，还对谚语以里谚、俚谚、俗谚、鄙谚、野谚、口彦、里语、鄙语、俗语、古话、常言等相称。这些界说与称谓，各执其理，各遣其词，但大多流于片面，偏重管窥谚语的俗传性特点。唯“前代故训”一说，倒多少点出了谚语的实质。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郭绍虞先生深入谚语若干本质特点，在《谚语的研究》中说：“谚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而用美的言词以表现者，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而规定人的行为之言语。”半个多世纪以来，谚家群起，界说更丰，但迄今也未能定于一尊。可喜的是，这些界说业已广涉谚语实质的方方面面，大体勾勒出了谚语作为科学字眼的涵义和范畴。

在此情况下，博采众长，为谚语草拟一个较为妥当的定义，应该说是可能的；由于要编《集成》，确定一种协调工作的界说，无疑也有必要。据此，我们便在《集成》编纂方案中权且作了这样的界定：“谚语是民间集体创作、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这个定义，未必尽善尽美，但实践表明，用它协调全国谚语集成工作，是基本可行的。当然，作为定义它只原则厘定了谚语的基本范围。为求进一步地理解和掌握它的实质，我们还须由此剖析谚语的基本特征。

谚语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从内容看，谚语首先具有经验性。它或源于直接感知，或兼含间接推理；或反映成功，或总结失败；无不是体验或观念的经验性结晶。谚语还富有哲理性。它总是升华带规律性的经验，洞察事物的本质，从而能够十分准确地表达出某种深邃而又闪光的见解，

具有令人折服的说理性和训诫性。

从形式看，谚语既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则无不具有通俗、上口的口语性特征。这一点甚至成为我们辨别谚与非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谚语又总是以最简约的形式，蕴涵最赅博的内容，表现出非凡的精练性。任何复杂纷繁的事物、抽象深奥的道理，一旦进入谚海便出奇地精练。谚语还以其高度的艺术性而被誉为“浓缩的诗”。在语言里，它既是特殊表达成份，又是艺术表达方式。它广用辞格，巧织句式，节奏鲜明，音韵铿锵；常见的形式是由两句构成，也有一句、三句、四句的；在技巧上，谚语还常常运用民间诗歌特有的排比、对偶、比喻、层递、倒装、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以增强其艺术上的感染力和论理中的说服力。

这里简略提到的只是谚语在内容、形式上所通常表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特征。为了厘定谚语的界限，同时还须以此为依据，去细辨谚语和它的近邻们的区别。编纂方案规定：“本《集成》只收谚语，不收俗语、格言、成语、歇后语。”方案所列“不收”诸语，便是易与谚语混淆的“近邻”。

在所有近邻中，俗语最易与谚语相混。这固然同谚语历来多和广义的俗语称谓混用有关，更因两者确实相距太近所致。我们所谓俗语，是指狭义俗语，即对于某种思想和社会生活进行直接间接形象化描述的定型语句。两者突出的区别是：谚语旨在推断某条道理或经验，而俗语则大多描述某种情状或性质；谚语必是完整的句子，而俗语则不乏短语式的“残句”，多需借助上下文，庶几完整句意。

谚语与格言一般不难区分。谚语系群众集体创作，查无作者，格言则多为名人“可为法式”的语录，有作者可查；谚语富口语特色，使用时可易字句，格言书面语特色较浓，且一字也不可改动。

谚语与成语可做多方面对比：谚语是整句，可单用；而成语多是词组或短语，只能充当句中的“词”。谚语只大体定型，使用时可小有变异；成语则非常定型，一般不容擅改。从风格特色看，谚语以俗为本，口语味儿浓；成语则文墨味儿重，多作书面引用。

在多数情况下，谚语与歇后语界限分明。谚语侧重言事言理，歇后语侧重喻形喻情；谚语主谓语浑然一体，歇后语喻解体若即若离，讲述时可以乃至必须有较长的停歇；谚语的“有效成份”蓄于全句，歇后语的“有效成份”只在后半句（解体）；谚语独立成句，歇后语多作句子成分，或依附某语言环境。

必须指出的是，谚语和它上述近邻虽可类分，但它们之间也有交叉现象，有的却也难以截然断面，因为它们毕竟共属一个语言大家族——熟语。它们在来源、语义、表达、流传等某一或某些方面，维系着或远或近、或浅或深的“血缘”，甚至难免“混血”跨类。我们既反对不分界限，又承认谚语和它的近邻有跨类交叉现象，例如：“满招损，谦受益”，既是格言，又是谚语；“漫天要价，落地还钱”，既是俗语，又是谚语；“哀兵必

胜”，既是成语，又是谚语；“单面锣打不响”，既是歇后语，又是谚语，这类相互交叉的作品，我们认为也可入《谚语集成》。

三

谚语，被誉为民间的知识总汇和大百科全书，蕴蓄着人类社会广博的智慧和经验。对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谚海大国来说，积累和弘扬谚语文化，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一千八百年前，东汉的崔寔就首先辑录当时流行于世的农谚作《四民月令》，成为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谚语采辑家。嗣后，又有三国吴陆玑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宋陈旉著《农书》、元娄元礼著《田家五行》、明徐光启著《农政全书》，皆循崔寔足迹悉心采集农牧渔副生产谚。全面发掘、辑录包括生产谚在内的各种谚语，一般认为当始于宋。宋人龚颐正的《释常谈》、周守忠的《古今谚》，系现存我国书海的最早的谚语大观。此后，明人杨升庵的《古今谚》、清人杜文澜的《古谣谚》、曾廷枚的《古谚谭》，以及近人李鉴堂的《俗语考原》、史襄哉的《中华谚海》、朱雨尊的《民间谚语全集》，等等，都是各自时代积累弘扬谚语文化的杰出成果。

值得瞩目的，历史上对于谚语遗产的传承光大，并不仅限于发掘辑录成书，更大量的，还表现在连楹充栋的各种典籍的广泛采用。就连对民间口头创作深怀阶级偏见的高贤雅士，有时也不得不屈尊俯就。《文心雕龙·书记》说，“夫文词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便是明证。事实也的确如此。先秦典籍保存的大批古谚，诸如《国语》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战国策》的“宁为鸡口，毋为牛后”、《韩非子》的“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等，历时两三千年，至今仍闪耀着华夏先人聪明才智的奇辉。现在仍活在人们口头上的“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忠言逆耳利于行，毒（今作良）药苦口利于病”等名谚，是《史记》流传于世的。唐宋以来，随着市民文学的蓬勃兴起，从唐人传奇、宋人平话，到元代杂剧、明清小说，被采撷入墨的谚语更是数不胜数。例如，单是《红楼梦》前八十回所引谚语，即达数百则之多。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用的“谣谚”，引起了当时文化界的特别关注。除继续大量采汇成书和引入写作外，郭绍虞、曹伯韩、钟敬文、黎锦熙、朱介凡等不少学者，纷纷起而著文立说，揭开了我国谚语现代研究的序幕。据曹伯韩先生当时统计，短短一二十年间，各省出版的谚语专著，即不下三四十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谚语的发掘与研究步入了崭新的时代。就发掘成书而论，从单类集子，到综合选编；从一般介绍，到分类诠释；从古谚寻源，到今谚集锦；从汉族

谚语概观，到少数民族作品合璧，不断有新集问世。就理论研讨而言，在有关谚语的搜集整理、界说分类、内容缕析、艺术探讨、语言寻踪，以至国内外谚语的比较研究等领域中，众多选题，有的已经成书，有的已始于谚语学者的探索笔触。在此期间，公开出版的专著和类书，少说也逾百余；见诸报刊的零星论文，更是数以千计。

古往今来，我国谚语宝藏业已展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喜人。然而，我们也无须讳言，这些已有的发掘与研究，较之我国谚语宝藏的实际储量，较之我国谚语研究的应有水平，较之世界谚语研究的发展形势，毕竟还很有限，或曰差距不小。全面发掘谚语文化遗产，致力提高谚语研究水平，进而卓然确立“中国谚语学”的光荣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中国谚语工作者的双肩。

有鉴于此，早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就积极酝酿并倡议在全面普查、采集的基础上，编纂出版包括《中国谚语集成》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丛书。这一倡议，得到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的高度重视与鼎力支持。1984年5月，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联合签发了关于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通知》；接着便组织班子，制订方案，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发掘、编纂谚语的宏大工程。

在1986年5月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三次工作会议上，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正式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列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

四

《中国谚语集成》以广集我国谚语之大成为己任，自1984年下达关于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通知》之后，《集成》工作通过全国省、地、县各级文化部门和《集成》机构，即纷纷培训骨干，发动群众，组织了全国性的谚语大普查、大采集。在普查采集过程中，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草原林海，到边寨渔村，无不遍布谚语工作者的辛劳足迹。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谚语的搜集犹如大海捞针，需要一点一滴、一句一条地积累，其工程之浩大、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正是靠着众多同志默默无闻的埋头苦干和献身精神，终为《集成》的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将永远记下他们的功绩。集成工作开展以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工作不甚平衡，但就普查面之广、采集量之多而言，已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编纂《方案》规定，“原则上以现今流传于世的作品为界，存于古籍而未见流传者，一般不予入书。”通过此次普查采集，全国“现今流传于世”的谚语，包括那些确已在口头流传而为群众所认可的新谚语，大体已经掌握。真正集我国数千年岁月、数十个民族谚语文化之大成以编纂成书，这在过去时代，断不可能做到，甚至连想也不敢想。这也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

下，才有可能完成的大业。

《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与出版，是在全国范围内囊括普查、采集、翻译（部分少数民族谚）、鉴别、遴选、分类、编排，以至印制出版等项内容的浩大的系统化工程。编纂《方案》总体要求，这项工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真实、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各民族谚语创作和流传的面貌，体现八十年代我国对民间谚语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的水平及成果”。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把确定一个明确的编辑指导方针，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由于谚海存在“两种文化”现象，加之许多谚条流传久远，时空跨度甚大，作为历史的产物，不能不受到时代的、思想观念上的局限，特别是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与干扰。因此，其中有些作品难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的、迷信的、宿命论的观念。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收作品时，必须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认真区别对待。凡属内容反动、格调低劣、对人民群众有害无益的作品，一律剔除不收。当然，我们也同时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始终注意把不同时代产生的作品，放回到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分析、观察，并从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多方位地去审评它们的功能与价值，而力求避免用今人的眼光去机械地、简单化地苛求和否定前人之作。因此，凡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揭示作用和认识价值的作品，尽管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已失去借鉴意义，我们依然予以收录。对于一些因受到历史的、认识上的局限，而带有狭隘性、片面性，在事理的分析上已显得陈旧过时的作品，只要它们尚属无害于民的传统佳作，我们也适当保留下来，以留给读者去批判地继承。此外，对于语言艺术上的特殊表达，诸如“母勤女不懒，父懒儿不勤”、“宁养败子，不养呆子”一类因强调某一点而故意极而言之作品，亦不简单视之为粗伪糟粕，动辄一笔删汰。总之，既注重社会效益，又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二者兼顾，审慎筛选，是本《集成》在编纂过程中贯彻始终的编辑指导方针。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对入选的作品严格贯彻“三性”原则。所谓“三性”，即一讲“科学性”，务求采集、整理、翻译、鉴别以至编排等各个环节，都具有忠实性、准确性，反对无视科学的随意性；二讲“全面性”，务求全书所收作品，基本囊括全国现今五十六个民族的各类谚语，包括富有实用和研究价值的异文变体；三讲“代表性”，务求入书作品业已经久流传，有较强延续性和一定覆盖面，在本地区、本民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凡属乡土味较浓之本地区代表作，有多少收多少；跨省的“通用”谚，也择优入书。这三条原则，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明确了《集成》的学术准绳，又提供了协调全国编纂工作的统一规范，以力求保证本书应有的质量。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按内容分类方式建立自己的编辑体系。谚

海的容蕴繁杂，按内容进行分类，虽有相当的难度，且迄今未见公认的内容分类范本，但为了增强本《集成》的可读性与可利用性，我们仍坚持采用了按内容分类体系。要求作品归类时各就各位，依类相从，并照顾各类作品内在的联系，以供查阅方便。我们试将入书谚语的内容分作“大、中、小”三个层次，进而在各个层次中按内容立目划类。要求全书各卷的类别“大一统，小变通”，即：高层类别各卷大同；中层类别各卷允许有若干增减调整；小层类别则可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谚条构成情况，灵活听便。小类中具体排列谚条时，各卷更可自酌内容而巧为编织，但求井然有序。尽管这样的分类编排方式还属一种尝试，偏颇不当之处自是难免，目的却是期望能用一条透射内容的视线，把犹如一颗颗微雕艺珠的谚语，有层次、有条理地贯串起来，既使全书在宏观上自成系统，又让各卷在分类上充分展示各地谚语宝藏的百态千姿；既有利于不同文化水平、多种生活阅历的各界读者随意检索，又方便诸多学科的研究家们从中摘取资料、进行研究。

《中国谚语集成》凡三十一卷（台湾卷暂缺），自1990年起一卷接一卷地同读者见面。它采自民间，又要带着油墨的馨香回到民间去。作为它的编纂者——我们及全国谚语集成工作者，对于世世代代中华儿女智慧和经验的宏伟结晶的成书问世，无不满怀喜悦之情。然而，正如谚语“瓜无滚圆，人无十全”所说，天下未见有十全十美之事。《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工作，限于主、客观诸多条件的不足，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罅漏，令人喜中隐忧。我们殷切期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正。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一月于北京

凡 例

一、本卷是根据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84)808号文件精神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总方案》、《中国谚语集成编辑细则》的规定,在全自治区范围内经过广泛深入地普查后,认真编选出西藏各地(市)、县《谚语卷》资料本;并参考了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西藏古典文学作品,以及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所出版过的有关书籍和个人搜集提供的资料等加以精选,严格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全面性的要求进行汇编的基础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组织在北京的专家和藏学家认真复审、核对,严格修定,重新分类编选而成。

二、本卷所收入的谚语,除在西藏自治区流传的藏族谚语为主外,还包括门巴族、珞巴族、僜巴人、夏尔巴人等生活在西藏地区各民族人民中间口头流传的,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且过去鲜为人们搜集到的谚语。此外,本卷为了体现民族团结,也收入了少量流藏在西藏的汉族和回族的优秀谚语。

三、本卷所收入的谚语,根据“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先用藏文直接记录和整理,然后进行分类,编选出《藏文卷》,最后在通过严格地复查、鉴别和筛选的基础上译成汉文稿。

四、本卷是从藏文翻译而成,为了译文符合汉语表达规律和习惯,又能忠实准确地反映原文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采取了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对于方言土语和地方性专有名词,有关宗教和民族风俗等方面必须说明的内容,以及一些费解的词和句子在当页注释或注音,其译文力求做到“信、达、雅”,并尽可能保持西藏各民族劳动人民口头文学的原貌。

五、本卷为了客观地反映西藏谚语的发展变化,保存谚语资料,收入了一些内容陈旧的谚语,并在编排上作了适当的处理。

六、本卷谚语均按内容分类编目,为事理、修养、社交、时政、风土、生活、行业、自然、附类等9类52目。本卷以《中国谚语集成编辑细则》为分类准则,同时根据西藏谚语的实际情况,作了一些调整,增设了《拉萨尔王传》谚语选粹、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等次目。

七、卷内谚语后面均标明采集地名,卷内谚语除标明族属外,均为藏族谚语。

八、本卷卷首有与西藏谚语内容关联的风物图片若干幅,《西藏自治区划图》一幅,提供读者了解与西藏谚语相关的各方面情况。因普查工作做得全面故不再附普查示意图。

九、本卷附录西藏谚语搜集(提供)者一览表,《中国谚语集成·西藏卷》地(市)资料本编辑人员一览表。

前 言

(一)

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北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毗邻,东连四川省,东南与云南省相连;南、西部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等国接壤,形成了中国与上述国家边境线的全部或一部分,全长近 4000 公里。全区土地面积为 122 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2.8%。

西藏的北部是连绵不断的唐古拉山,南部的喜马拉雅山成为这片高地的天然屏障,西边是高耸入云的喀喇昆仑山,东边是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正是重重雪山的环境和拱卫,使它形成了海拔平均 4000 米以上的雄伟壮丽的雪域高原。地理学家们称之为“世界的屋脊”,或者“地球第三极”。

喜马拉雅,意为“雪的家乡”。它由许多东西走向的平行山脉组成,主要部分坐落在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的交界线上,全长 2400 公里,平均海拔 6000 米以上。海拔 8848 米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高高隆起于中尼边境的雪山群峰之巅;周围还有 8000 米以上的高峰 4 座、7000 米以上的高峰 38 座,构成了西藏高原最为密集、最为雄奇、最为瑰丽的“世界屋脊”景观。

西藏高原是诸多国际河流的源头。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孔雀河、象泉河、狮泉河都从这里的皑皑雪山之间流出。雅鲁藏布江是西藏第一大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仲巴县境内的杰马央宗冰川,最后经珞瑜地区流入印度,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它全长 2057 公里,流域面积 24 万多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河,也是藏族人民的母亲之河。地处米林、墨脱之间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达 5382 米,全长 496 公里,是地球上最深的峡谷。

广袤的高原上密布着大小湖泊 1500 多个,湖泊面积总计 24183 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湖泊密集区,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范围最大、数量最多的高原湖泊区。阿里的玛旁雍错湖,藏北的纳木错湖,山南的羊卓雍湖,被称为雪域高原的三大神湖。它们像玉兰的松耳石,镶嵌在雪山草原之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把周围的风光装点得如同仙境。

(二)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考古发掘的古文化遗址证实,早在四、五千年前,藏民族的祖先就在这块雪山高耸、雪水长流的土地上农牧渔猎,繁衍生息,并且与中原汉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系。

公元7世纪初,藏王松赞干布兼并了雪域高原上各个部落,建立西藏历史上空前统一和强盛的吐蕃王朝,并与东方的大唐亲善友好,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随着唐蕃两次和亲、八次会盟,两族“和同如一家”,商量“社稷如一”,“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为此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元世祖忽必烈敕封西藏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大元帝师,领总制院,授与管理西藏13万户的大权。公元14世纪后期,明朝中央封西藏帕珠王朝的首领为“灌顶国师”“阐化王”,采取“尚用僧徒”、“多封众建”的办法管理西藏。公元17世纪中叶,清朝中央封西藏政教领袖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的地位得到清朝中央的正式承认,形成历辈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经过中央承认和册封的历史定制。清朝还派驻藏大臣督办西藏政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

公元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内地得手后,很快把侵略魔爪伸到他们垂涎已久的西藏。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军队两次侵略西藏,屠杀数以千计的僧俗民众,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1913年,英帝国主义又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妄图使分裂西藏合法化。这次会议遭到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会议以破裂而告终。从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西藏独立”的斗争,提上了全国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的革命日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西藏人民从此生活在平等、团结、互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帝国主义势力从此被彻底驱逐出西藏。1959年,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在世界屋脊上展开。百万农奴从此站了起来,成了土地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也成为自身的主人。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正式实施。此后,“文化革命”十年动乱,给西藏各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西藏高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国家在这里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加快发展经济文化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广泛的民主权利。1994年,国家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一系列西藏稳定发展的措施,同时加快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步伐。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正出现在